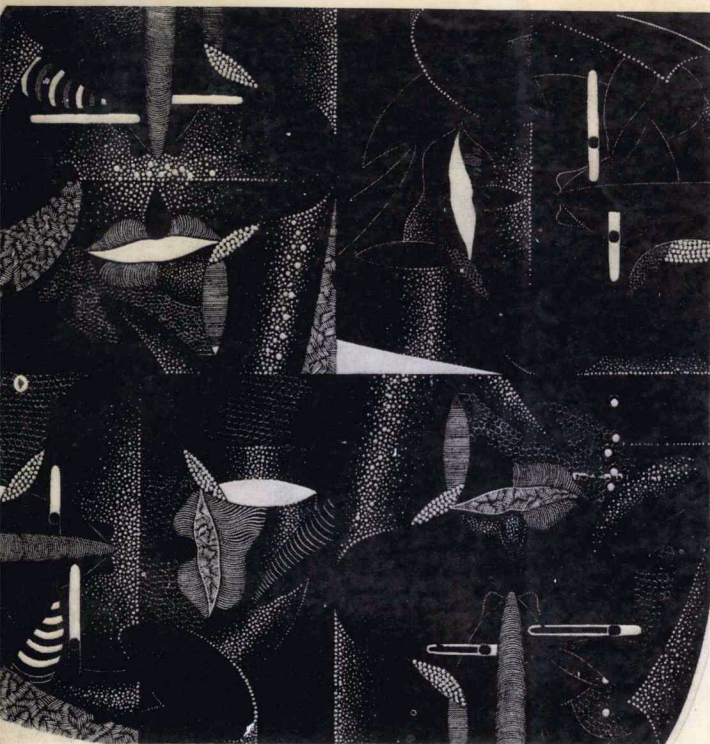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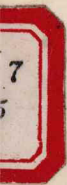
●新时期通俗文学丛书



十年喧嚣沉思录

——新时期通俗文学热扫描

刘卓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十年喧嚣沉思录

新时期通俗文学热扫描

刘卓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1年·沈阳

十年喧嚣沉思录

——新时期通俗文学热扫描

刘 卓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199,000 开本：850×1168 1/4 印张：8 5/8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800

责任编辑：杨爱群

责任校对：李 凡

封面设计：庄庆芳

ISBN 7-5313-0526-7/I·494 定价：4.50 元

出版说明

新时期通俗文学走过了十年的路程。这十年，潮涨潮落，波平浪起。武侠小说热、言情小说热、传奇文学热、法制文学热、纪实文学热……至今，这些热点还在人们的脑海中萦绕着。

我们出版这套《新时期通俗文学丛书》旨在瞻顾过去，观照现实，开拓未来。《丛书》包括一部理论著作和五部作品集。《十年喧嚣沉思录——新时期通俗文学热扫描》一书，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新时期通俗文学的理论专著。它从创作、编辑、出版、管理、销售、欣赏、反馈等多个环节作散点透视，从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上把握十年通俗文学发展历程，给其以一个全息摄像。而丛书中的《武侠小说选萃》，《言情小说选萃》，《传奇文学选萃》，《法制文学选萃》，《纪实文学选萃》则与《十年喧嚣沉思录——新时期通俗文学热扫描》互为补充、互为映衬，进一步勾勒出通俗文学发展的风貌。

我们力图编选出版熔思想性、知识性、娱乐性为一炉的较高品味的佳作，以饕读者。然而，由于资料有限，水平不高，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望读者予以指正。

春风文艺出版社

目 录

一 一个称雄文坛的大潮.....	1
1 “杂牌军”入主文坛.....	5
2 写“通俗”纷纷“下海”.....	14
3 文化市场采风录.....	20
4 书亭窗口话经营.....	27
5 信息来自编辑部.....	34
二 复涌不衰的五大热点.....	43
1 武侠类：成年人的童话.....	46
2 言情类：荒野的呼唤.....	56
3 法制类：罪与罚的较量.....	69
4 传奇类：唯奇才能传.....	82
5 纪实类：信息与文学婚配.....	91
三 复兴机制的本质考察.....	102

1 众神真渴极了	
——心理潜能的释放.....	105
2 文艺功能多极化	
——文艺结构的完备.....	111
3 欣赏趣味多元化	
——审美心理的健全.....	119
4 积极跟踪的界评论	
——信息反馈的作.....	129
5 艺术生产力的爆发	
——作家心灵的解放.....	143

四 流于失控的出版热.....	151
1 “逼良为娼”咏叹调.....	154
2 “擦边球”与“双保险”.....	161
3 图书结构的失衡.....	167
4 主管部门走访记.....	172
5 困境中的施控措施.....	180

五 “文化浊流”批判备忘录.....	185
1 触目惊心的黄潮泛滥.....	188
2 惑乱人心的“曝光”、“揭秘”.....	198
3 “神秘”、“怪异”事件的宣传.....	205
4 “凶杀”、“恐怖”的恶性描写.....	210
5 “扫黄”战役惊雷滚滚.....	214

六 雅俗共建的文化战略.....	222
1 雅俗共生的文学架构.....	226

一 一个称雄文坛的大潮

从1980年评书热的兴起，到1990年“扫黄”初战告捷，通俗文学整整走过了十年历程。这是一个完整的历史段落。

从大文化范畴讲，整个八十年代都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期。在民族文化复兴的总体格局中，作为文化的审美形态——文学艺术，空前繁盛，而通俗文学则是一股令人目眩的大潮。八十年代是个多“热点”的时代，各种“热点”此起彼伏：文凭热、港歌热、气功热、经商热、出国热、家具热、君子兰热、牛仔裤热、迪斯科热、台湾校园歌曲热、费翔热、“西北风”热、方法论热、寻根热、麻将热、人体影画热……以文化学角度论，这些都属于文化热。区别在于不同的热点代表了不同的文化层次。但凡此种种，不论兴起的规模和持续的时间，都远不及通俗文学热。十年来，它如一场春风野火弥漫了神州大地，而且保持着罕见的高温。从这个意义上讲，通俗文学热是一个文化奇观，而且是旷世仅见的文化奇观。但这个奇观并不都是通体光明，其中也有翻滚的浊流，若论十年，它的功过是非都是那样显赫惊人，使任何论者不敢轻描淡写，一笔带过。

马克思主义观点强调全面地本质地看问题，最反对简单化。不能因为开展“扫黄”斗争就否定了它十年的建功立业；

但也不可无视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精神健康的黄潮泛滥。党中央提出的“一手抓繁荣，一手抓整顿”的方针，正是依据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要求和文艺界现状制定出来的。整顿是为了更好的繁荣。1990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首届中国大众文学奖”颁奖大会，评选出《苍生》《庄妃》等六部长篇小说和《旅人蕉》等四部中篇小说，这表明国家文化领导部门对真正体现社会主义方向、代表社会主义文艺美学品格的优秀创作是热情鼓励和扶持的；但同时，对文化市场上那些乌烟瘴气的东西，则采取了坚决的毫不容情的销毁措施。这是“一手抓繁荣，一手抓整顿”方针的具体实施，体现了中央对文艺工作的全方位政策。认真回顾，这个方针的精神是贯穿十年始终的，这给我们归结十年的文艺历史提供了清晰的思想烛照。

八十年代后期这几年，雅俗文学都出现了戏剧性的结局：十年间都曾称雄过文坛的雅、俗两脉，却底几同时进入低谷。相当一部分雅文学因脱离了人民群众这个审美广大地带而失却了轰动效应，俗文学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因放浪形骸而受到官方的明令查禁。轰轰烈烈的开场却是凄凄惶惶的结尾，这对雅、俗二者都是带悲剧性的现实。不论来自民间的或官方的惩罚，都将促使二者冷静反思自身十年所走过的道路，特别是应当从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道路和性质以及与民族文化的关系这样一个高度，去总结经验教训。毛泽东同志早在48年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文艺的发展方向和服务对象。这是基于对中国革命斗争目标的需要并适合中华民族文化特点而提出的，它把革命性与民族性高度统一起来。而十年后期雅文学的部分贵族化和俗文学的部分庸俗化，在本质上是一个东西，就是违背了民族文化的人民大众性，这也就必然违背社会主义方向、道路这个根本原则所集中体现出

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不论把文艺引入贵族沙龙式的小圈子，还是引入都市低级小市民的大圈子，都是从根本上与人民的利益对立的。特别是十年后期，某些打着“纪实”旗号的作品十分放肆，不顾中国人民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过多披露其所谓“秘闻”，还有一些政治性纪实泄露了党内政治斗争机密，在人民群众中造成思想混乱；某些性爱类纪实越写越荒唐，名为“揭秘”、“曝光”，实则起到诱惑群众的作用。有的甚至公开宣扬性解放、性互利、性自由等性罪错理论，严重腐蚀了人民群众的灵魂，也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遭到破坏。而且侵害的范围相当广泛。这都是违背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违背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的神圣职责和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在评价通俗文学十年历史时，是不应忽略后期这个不光彩的结尾的。

十年中，通俗文学打破了雅文学千百年来的大一统局面，称雄了文坛，这是一件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在这以前，由于中国封建正统文化思想的压抑和文化惯性的影响，俗文学一直未能称雄于文坛。在中国近代康、梁等启蒙主义思想家发动“小说界革命”以前，连最有社会教化力的小说都被视为“邪宗”，通俗文学也只配是“引车卖浆者言”。以八股词章、四书五经为正宗的传统文学观念过于强大，使通俗文学两千多年来不能登大雅之堂，只好在民间唱“野台子戏”。但事实上俗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也确实有过“风光”的时候。大唐时代寺院中僧侣们动听的变文俗讲，曾吸引过万千“愚夫冶妇”，“听者填咽寺舍”，有“转相鼓扇扶树”的艺术效应，但哪里比得上“盛唐之音”的至尊地位！两宋时期，市井游乐风起，瓦肆勾栏兴于都市，上百余种“说话”科目吸引万千市民，不避风雨寒暑前来聚会，“终日居此，不觉抵暮”，但又何曾领受过“宋词”、

“骈文”这些高雅文体的风骚？至于联想到明清时期的“说话”艺术，《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三侠五义》等书，哪一部没有轰动效应？但也并未从根本上扭转文学史上尊雅抑俗的局面。面对来自市井的俗文学喧嚣，雅文学似乎不屑一顾，依然故我地保持着矜持的尊容。“五四”新文学开始后，文学负起社会启蒙和战斗的使命，高扬着“为人生”的旗帜，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但当时民族文学理论倡导中却有一种民族自卑意识，文学实践方面也有一种向西模仿的附庸意识，大大压抑了中国土生土长的俗文学，使之未能跟随“五四”新文化旗帜冲向文学革命的中心舞台，甚至出现了批判旧小说的扩大化，对张恨水、周瘦鹃等有成就的俗小说家也统统加以批判，俗文学从此一蹶不振，余惊长期留在文坛。新中国开始后又为通俗文学起飞提供了时代的机缘，刘知侠、曲波、李英儒、刘流等一批作家，写出了激动人心的革命英雄传奇小说《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烈火金钢》等，但由于左的思潮影响和传统文化观念的惯性作用，也还没有把通俗文学提到与雅文学比肩而立的地位。这些优秀的雅俗兼容的作品，往往成为当代文学史上仅供点缀之用的饰物，一般不是文学史的重点内容，有时只在“概述”中略加介绍。许多已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还不是一部雅、俗兼备的历史，基本还是一部雅文学的历史。

这，显然是历史的不公正。

然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以后却不同了！自古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的俗文学轰然崛起，以盖世的雄风冲向文坛，占据了文学舞台的中心位置！不公正的历史，等待着平反。

本来，新时期的俗文学，起步是晚于雅文学的。公论1976

年丙辰清明的天安门诗歌运动是新时期文学的先声，可那时，文学刚刚冲破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走出死谷，一路徘徊和彷徨，俗文学更是一片沉寂的荒原。可就在这片荒原下，奔突的熔岩已不可遏止。雅文学不曾想到，睡在自己身边的这片荒原，不久就会石破天惊，一场“东宫易主”的悲喜剧就要发生了。当沉寂的火山爆发以后，雅文学开始还表现出沙场宿将临变不惊的从容风度，并不太介意。因为从五四新文学以来它一身战尘、赫赫战功，已牢固奠定在文坛的独尊地位，这使它深陷在历史功利的自信中而毫不怀疑会有争天下的一场鏖战在即。可是后来，当俗文学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冒土，书摊书亭越设越多，人们成堆挤在书亭窗口争购畅销书，俗文学书刊销量急剧上升，而自身的销量却每日剧减，终于门庭冷落车马稀的时候，它再也吃不住劲了，于是发出一片惊呼：

“俗文学要吃掉雅文学！”

“杂牌军压倒了正规军！”

1 “杂牌军”入主文坛

通俗文学确实是一支“杂牌军”。这不仅因为它是囊括了武侠、言情、法制、传奇、纪实、志异、民俗等种类在内的庞大的科目体系，而且也因为它在传统的文学观念里一直不是文坛的嫡亲。虽然，郑振铎先生在他早年写下的《中国俗文学史》一书中曾认定：“‘俗文学’不仅成了中国文学史的主要成份，且也成了中国文学史的中心。”（第2页，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但这也也许是对一定时期的文学史实的判定，在传统文学观念那里却并未取得普遍的认同。自康、梁发动“小说界革命”以后，历来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地位倒是比过

去提高了不少，开始在社会改造中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但这也只是从观念上克服了文人学士们对它的“邪宗”印象，至多算是开始恢复它文学上的“正宗”地位。但从文学史书上的位置来说，它仍构不成“中国文学的主要成份”和“中国文学史的中心”。承认它的“正宗”地位并不等于就承认了它的“中心”地位。“正宗”与“中心”是有区别的。这就是说，通俗文学的地位问题并未真正地得到承认，文学史实和文学史书在这个问题上的观念，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历史也只是在粉碎“四人帮”后才给通俗文学进入中心地位提供了机缘。

严格地说，雅文学与俗文学不应当存在争夺中心地位的问题。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学史，都应当是一部雅俗共生、雅俗共荣的历史。雅俗本是同根生、分水流，分别代表了不同层面的两种文化类型和审美图式，它们都是民族文化总体架构上的板块，缺一不可，也不应分出主次贵贱。但中国数千年的封建正统文化思想却造成了文坛尊雅抑俗、重雅轻俗、雅贵俗贱的畸型局面，这无论是从事实上或理论上都是讲不通的。这种畸型局面的形成使俗文学长期处于被压抑的地位，在历史没有给它提供机会的时候，它只是蓄积着反弹的力量，并没有爆发，一旦历史为它提供了机会，它就再也不能甘心于文坛的屈从地位，揭竿而起，要同雅文学争雄了。这实在是不正常的历史状态造成的后果。说得尖刻一点，这是一种历史的报应。当然，它所以能打破雅文学保持的数千年一统天下的地位，也是有多种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的。中心地位的易换也不单纯取决于两种文学自身力量的抗衡和竞争，如若没有多种社会条件的辅助，俗文学要替代雅文学的中心位置怕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最根本的原因，是俗文学选择了雅文学长期与人民大众拉开的审美断裂地带爆发“革命”，这也是雅文学失去中心地位

的沉重教训所在。众所周知，建国30年中，一次又一次左的文艺思潮使文艺变成了政治的附庸。文化革命中更把文艺的附庸地位推向极端。“双百”方针被严重践踏，文艺界一片凋零。八亿人口八个样板戏，把文艺欣赏变成单纯的政治说教。这使文艺的多向功能单一化，根本无法满足人民大众多元化的审美需求。文艺教化功能的绝对性强调，不仅使人民群众日甚一日地产生着审美厌倦，而且也破坏了艺术自身的多元美学结构，断送着艺术的生命。文学艺术本是以情动人的，然而文革时代那些“光棍文学”、“寡妇文学”、“阴谋文艺”却扼杀人性人情，宣传政治阴谋，伪造生活，颠倒历史，不仅引不起人民群众的精神共鸣，而且早已为人民群众深深厌恶。中国人民大众几千年形成的超稳态的审美心理结构未及转换，就被强行拉去接受各种政治附庸式作品的疲劳轰炸，社会主义文艺和它的欣赏者人民大众一起被赶进了精神的死谷。通俗文学正是从这条死谷中冲杀出来的，它相当及时地选择了最枯竭的审美心理地带揭竿而起。它一出山就恢复了文学的多元美学结构，以多向性审美功能冲击人民群众的多元性审美心理。通俗文学的强点也正是雅文学的弱点。在这强弱的反差对比中，通俗文学因得民心而得到人们的选择，雅文学因失民心而受到人们的冷落，这不是很自然的历史规律吗？雅、俗文学的沉浮雄辩说明，文艺与人民大众的关系，是文艺生死枯荣的生命线。

八十年代初是个很有戏剧性的开端。当时雅文学正在认真演奏着“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这些雄壮严肃的社会乐章，强烈扣击着人们的政治情绪。但几乎不见任何宣言和战表，通俗文学异军突起了。仿佛文学舞台上突然发出了变奏，一阵野性狂放的“旋风霹雳”冲了上来。它舞步奔放姿肆，舞态变化无穷，节奏自由舒展，旋转刚健有力，爆发

出自由奔腾的生命活力，令人眼花缭乱。它是充满野性的不规范的，唯有令人怦然心跳的真诚与大胆。上自宫廷秘闻，下至闾巷隐情；远至王室兴废，近至庶民悲欢，题材的开放使人惊异。也许这狂放的野性开始就种下了后来的祸秧，但当时却带给人们从未尝受过的审美快感和新异性，为后来艺术消费与艺术生产的双向巨增提供了契机。入主文坛也不是在乱军中取胜的。也许并没有一个总导演在策划通俗文学进军的路线，但它的推进却是步步为营，极有层次的。它的出师先是以历史英雄主义壮歌为号角，80年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岳飞传》和其后不久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通过电台和电视传到千家万户，使人壮怀激烈；紧接着，英国侦探小说家克利斯蒂的侦探惊险小说《尼罗河上的惨案》、《东方快车谋杀案》和日本侦探小说家森村诚一的侦探惊险小说传入中土，那奇特的情节，新颖的手法，使中国读者与观众大觉异趣；1983年前后，香港、日本的武打功夫片和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小说涌入大陆，精湛的武功使观众与读者大饱眼福，遂之卷起“少林热”“武当热”；1985年前后，台湾女作家琼瑶的言情小说风靡大陆，使不知多少钟情男女如痴如醉，一度琼瑶小说脱销如“洛阳纸贵”。这四股人民群众的欣赏热，为通俗文学畅销打开了通道，同时，一个为数可观的读者群形成了。艺术生产又受到人民群众欣赏热的刺激，在中国大陆出现滚滚滔滔的历史英雄传奇，武侠、侦破、言情小说竞写潮。

八十年代中期，俗文学完成了入主文坛，迎来了它有史以来最辉煌的鼎盛期。这里有必要录下这个文化奇观最精彩的几个“景点”，作为民族文化复兴的历史“镜头”：

①出版事业突飞猛进

下列两个表格是具有说服力的：

表一：近十年来图书报刊品种发展情况对照表（此表为1989年“沈阳市扫黄展览会”提供）

(1979—1988)

	1979	1988
出版社	129 (家)	502 (家)
图书	17,210 (种)	65,960 (种)
期刊	1,470 (种)	5,860 (种)
报纸	70 (种)	1,520 (种)

表二：建国以来我国书报刊出版品种一览表（此表为1989年“沈阳市扫黄展览会”提供）

(1949—1988)

年 份	图 书	期 刊	报 纸
1949—1978	473,582(种)	11,525 (种)	7,162 (种)
1979—1988	410,544(种)	39,319 (种)	9,272 (种)
合 计	884,126(种)	50,844 (种)	16,434 (种)

这两个表格的时间都截止到1988年，显然不是近十年的全部统计。但是可以看出出版事业的巨大发展。这两个表格的数字当然是包括雅、俗文学及其他各类文化书刊在内的总合，但其中通俗文学的数量比例占压倒优势，这是毫无疑问的。抛开通俗文学图书不算，仅就通俗文学期刊而言，从来自国家新闻

出版署的数字统计就有190多种。绝大多数俗文学刊物是近十年中新创刊的。

②书刊发行数量惊人

仅冯育楠的《津门大侠霍元甲》一书，就印行180万册。武汉的《今古奇观》每期发行量达100万册以上。北京的《北国风》每期发行量在50——100万册之间。河南的《传奇文学选刊》每期发行量达60万册左右。北京的《啄木鸟》每期发行量达180万册左右。上海的《故事会》每期发行量达500万册。杭州的《山海经》每期发行量达400万册。吉林的《关东文学》每期发行量达300万册。长春的《民俗报》每期发行量达110万份。长沙的《传奇集粹》每辑发行量达25—30万册。上海的《上海故事》每期发行量达150万册。吉林的《松辽文学》每期发行量达40万册。河北的《神州传奇》每期发行量达100万册。广东的《天南》每期发行量达15万册。安徽的《法制文学选刊》每期发行量达70万册。辽宁的《纪实文学》、《大众小说》每期发行量达10万册。辽宁的《文学大观》每期发行量达40万册。抚顺的《故事报》每期发行量达160万份。刊物分大、中、小三种类型：《今古奇观》、《啄木鸟》等属于大型的；《北国风》、《文学大观》等属于中型的；《故事会》，等属于小型的。全国还有许多俗文学期刊，发行数未及统计，但大都每期在10万以上。这些数字是它们鼎盛期的发行数，并不长期固定，有些刊物的发行数浮动很大，如《文学大观》1988年时平均每月发行60万册，而，1989年有几期降为30万左右。下降幅度较大的原因是纸张涨价、工本费提高及社会热点转移等多种社会因素。但即使维持在最低销量，发行数也够惊人的了。书刊报纸的发行数，是与读者群的数量等同的，有多大的发行量就有

多大的读者群。俗文学书刊的发行量与读者群，是雅文学无法匹敌的。

③书亭书摊遍地流

随着1985年以后通俗文学的热化，国营与私营的书亭书摊空前增多，星罗棋布在城镇的大街小巷，这是近十年中又一奇异的文化景观，这种景观是文化革命和前十七年根本没有的。尤其是个体经营的书亭书摊，成为我国出版发行行业的一支新军，是国营新华书店和零售网点的重要补充，有人称之为“第二渠道”。它们遍布街头巷口，占地不大，随行就市，十分灵活，给广大群众的文化消费带来很大方便。这是一些流动的开架书店，任凭读者随意挑选。摊亭主人如同自由市场上的菜农熟悉他们的顾客心理一样，深谙社会读者频繁变动的审美趣味，不断更换图书品种，日销书额都很可观。据来自国家新闻出版署的数字统计，截止到1988年底，全国共有个体书店、书亭、书摊25689处。图书摊亭的空间密度也越来越大。往往在一个中心街口，设有四五处摊点。这些街头摊亭等于为顾客“送货上门”，比位处高层大楼的国营书店灵活多了。这些图书摊亭以争相贩售抢手的通俗文学作品为快事，群众每一次欣赏热都与它们的经销有直接关系。他们变过去书店被动的等待销售为积极主动想方设法的推销，方法灵活多样。铅印与手写的书刊广告及口头叫卖宣传，大大扩展了销路。人们把图书销售戏称捣腾“软黄金”，不少书贩确实由此发家，成为巨富。

④群众购书热与欣赏热

文化市场的繁荣，除了表现在书刊品种的繁多外，还表现在群众绵延不衰的购书热与欣赏热上。多年来，书亭书摊前面